

汉学刊

第 2 辑



200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从文学刊

第二辑

主 编：张建永 余佐辰

执行主编：杨瑞仁 简德彬

副 主 编：向成国 田茂军 李端生

吉首大学《从文学刊》编辑部 编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文学刊(第二辑)/张建永 余佐辰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6

(文学时空作家书库. 第5辑/一叶主编)

ISBN 7-5034-1639-4

I. 从… II. ①张… ②余… III. 沈从文(1902~1988)
- 中篇小说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I207.4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601 号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张 冀 电脑打字:苏琼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刷装订: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13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5

字 数:36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7.5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印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沈从文研究

生命诗学: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新探	吴投文/1
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边城》创作	陈文敏/22
《边城》——中国人格基本态度与信念的赞歌 ...	彭秀海 贾米勤/36
沈从文的“时间”意识	章新菊/50
沈从文与《圣经》	梁靖芬/64
内在紧张的情境分析	
——试论沈从文昆明时期哲思散文	彭大庆 田 红/123
论《湘西》的新闻价值	唐莉敏/131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特征及其成因	刘海军/142
沈从文文化阐释本土视阈的人类学解读	何小平/194
“湖湘四记”简论	王明辉/220
女性形象与东方作家自我	
——论泰戈尔、沈从文、川端康成的女性塑造	杨玉珍/239
沈从文接受史研究	舒刚波/274
沈虎维先生湘西文化考察谈话摘要	郑英杰 谷遇春等整理/315
咸宁双溪行	
——“五·七”干校访沈老	安国鹏/323
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与篇名的翻译	彭 京/336

黄永玉研究

《黄永玉年谱》序

- 一个小蛮子对一个老蛮子的窥视 张建永/343
- 黄永玉年谱(1924 - 1949) 王煥林/348
- 一个街坊人眼中的黄永玉
- 画册《黄永玉八十》序言 刘一友/380
- 从黄永玉的比较文学得出的定义 杨瑞仁/400
- 黄永玉与故乡 刘祖武/405

乡土美学研究

乡土何谓?

- 乡土美学引论之一 简德彬/412
- 乡土美学的新世纪意义 王岳川/426
- 全球化重组中的中国乡土美学 张 法/431
- 乡土美学:审美历史地理学 肖 鹰/434
- 乡土文学中的都市理念和乡土精神 张建永/438

民族文化研究

脚下的美丽

- 湘西鞋垫制作浅析 马红娟/441
- 巧手飞针走线 慧眼识美变宝
- 湘西鞋垫主体性浅探 彭 勤/454
- 湘西鞋垫的审美观照 陈 静/465
- 征稿启事 编 者/475

生命诗学：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新探

吴投文*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读者来说,不仅他对于文学的贡献是一个奇迹,而且他本身的生命经历也无异于一个奇迹。确实,这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人。他的生命经历充满传奇般的色彩,其中有三变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一变是以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而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二变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突然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转而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不凡的业绩;三变是在晚年才终于像“出土文物”一样被人发现,早年的作品得以大量出版,并陡然成为研究界的一个热点,而且持久不衰。沈从文这样传奇般的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沈从文来说,晚年发生的奇迹也许最具有个人意义,这表明他的作品已经初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一些名作在某种程度上已获得经典意义上的定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梦寐以求的。对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奇迹则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但

* 作者:吴投文,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历史也许总是沉重的,沈从文身上所负载的那部分历史又似乎格外沉重,最容易让人在沉思中体会到那份历史的沧桑感。在我看来,在沈从文传奇般的“三变”经历中,在他创造的奇迹中,似乎隐藏着比历史更深更沉重的东西。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代表他的主体独特性,代表他看取生命的独特性,其全部创作独特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也许正是这种东西才使沈从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并最终使他在尘封数十年之后又奇迹般地得以“出土”,让读者和研究者的目光再度聚焦在这位湘西的“乡下人”身上。

在1979年10月为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重新刊发所写的附记中,沈从文不无苦涩地谈及自己的作品在建国后的遭遇,“我的作品,早在五三年间,就由印行我选集的开明书店正式通知,说是各书已过时,凡是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全部代为焚毁。随后是香港方面转载台湾一道明白法令,更进一步,法令中指明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毁外,还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这倒是历史上少有的奇闻”^[1]。建国后,沈从文几乎完全淡出文坛,不为读者所知。他在1959年3月给大哥沈云六的信中谈到过这一情况,对当时“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感到极为痛心,认为这“真可说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2]。尽管他仍有少数几篇作品得以公开发表,但几乎都属于应景式文章,已完全失去他惯有的独特风格,因此,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在建国后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一个作为物质文化史家的沈从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政治的重大调整期,文学也因时而变,实现由政治化到回归本体的重大转型,一大批作家高唱“归来的歌”重返文坛,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作品得以重新出版,成为“重放的鲜花”。但沈从文的“出土”却并不顺利,一直伴随着很大的争议。朱光潜在1983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

学作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3]。现在看来,朱光潜所得到的“世界文学情报”也许不无片面性,他对沈从文的评价和预见却是极有见地的,但在当时却引起一场风波。社会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制约性仍然存在,而且在趋于激化时,还会以出于惯性的行政方式干预对作家的重新评价。沈从文在这一时期致凌宇的信中表达过对这种情形的担忧:“我担心处,是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实,必致灾星。”^[4]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几乎与朱光潜文章发表的同时,湖南岳阳的《洞庭湖》杂志在1983年发起历时达一年之久的对沈从文作品的讨论,在1984年发表的《沈从文〈雨后〉等作品座谈讨论纪要》中,该刊主编罗石贤等人认为,“《雨后》可以说是《毛毛雨》的姐妹篇”,“我看《雨后》是活生生的《春宫图》”,在同时以该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对沈从文作品要做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文中,则声称“编辑部的主要意图是,希望在赞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热潮’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浇上一瓢冷水”,并“大喝一声”,促使人们警醒,尤其是文学青年更要避免“误入歧途”。这种论调可以说是建国前夕郭沫若等人把沈从文归为“桃红色作家”的翻版。郭沫若1948年初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痛斥沈从文不仅“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且“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图”^[5]。这种前后相承的论调表明,在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下,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内涵和独特性追求被剥离无余,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生命意识被完全遮蔽,其艺术风格上所表现出来的独创性也被扭曲为创作上的歧途。事实证明朱光潜的预见是正确的,在重新评价沈从文的论争中,以《洞庭湖》杂志为代表的论调很快就偃旗息鼓,在随后的重写文学史热潮中,沈从文的行情不断看涨,被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过围绕着沈从文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深入到更深的层面,这表明沈从文研究在不断取得深化。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其全部创作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艺术格局。长期以来,他要么被看作“空虚的作家”、“没有思想的作家”,要么被誉为“抒情诗人”、“乡土作家”、“水墨画家”、“文体专家”和“文字魔术师”。不用说前一种说法已经破产,后一种说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仍然代表人们对沈从文创作的基本看法。确实,这些称誉就沈从文创作题材与风格的某一方面来说,是有其道理的,但也表明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与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误区。这些称誉几乎都是针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而言,由此造成对沈从文都市题材作品的遮蔽,在人们看来,沈从文只是一个典型的牧歌型作家,从而进一步造成对沈从文作品现实感的遮蔽,沈从文强烈的人生悲悯感与现实参与感在这种误读中被消解无余。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学沈从文只学其风习描写,不过得其皮毛。读沈从文而读不出现实感,现代文学思想魅力所在的使命感,也终不能读懂沈从文”^[6]。正是这种双重遮蔽,导致沈从文的本来面目一直模糊不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他作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准确定位,这也表明进一步深化沈从文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沈从文创作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视和夸大其局限性都不是理性的态度。沈从文最初呈现在笔者的视野中,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公共化”的牧歌型作家,随着阅读的深入,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沈从文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这才领受到阅读沈从文那种两极化的双重感受,对他的优长之处与局限性都有一份比此前更深的了解。就阅读效应来说,他算不上一位具有可读性的作家。整体性地阅读沈从文,是一项非常需要忍耐力的工作。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此大量的作品,如此参差不齐的局面集中在一个作家身上实在让人不胜惊讶而又感慨不已。”他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困惑以至隐隐的惶恐”。^[7]我在较为全面地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时,也陷入同样的困境,一方面为《边城》

等众多小说散文杰作和许多优秀文论深深陶醉,另一方面又对其大量的芜杂之作和为数不少几近复制性的重复之作几乎难以忍受,尤其是其前后期作品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这种阅读中对比分明的双重感受,似乎比阅读其他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更为强烈,以至使我很难把这种两极化的双重感受统一起来。但是,沈从文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不管他的前后期作品之间、成熟之作与芜杂之作之间的差距是多么之大,既然出自同一主体,就总有其一脉相承之处,不可能完全没有一个统贯性的东西。就我阅读后的总体印象来说,尽管沈从文的前期作品极其幼稚,乃至笨拙,然而是从生命中自然流出来的东西,流溢出生命之真,具有本色之美,与真实的人生出于一体,因而绝假纯真,自有其动人的地方,这是其价值所在。这也许是沈从文初出文坛就受到关注并最终立足文坛的根本原因。包括这些早期作品在内的大量芜杂之作,不管其在思想和艺术上存在着多么大的缺陷,其基调都大抵出自生命之真,应该说,这是沈从文得以成功的秘诀。沈从文是一个紧紧抓住生命的作家,他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抒写生命之真,思考生命之理,这成为他全部创作的基调和底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是有其内在统一性的,生命是其全部创作的统摄性因素或核心所在。

在笔者看来,沈从文是一个生命型作家。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作家都应该是生命型的。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生命活动,而且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生命活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其创作的最终指向总是离不开生命,其作品则是生命活动的形式,一种生命形式。正如苏珊·朗格在其《艺术问题》一书所指出的,“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这使作品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这说明文学与人的生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过就一般作家来说,其创作往往指向社会生活,停留于或仅仅满足于对社会生活表象的罗列或表层挖掘,而不能

指向更深层更内在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命状态。创作品格的高下之分就在这里表现出来,杰出作家的创作总是力图指向深层的人类生命状态,一般作家的创作则无力或满足于指向表层的人类社会生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生命型作家,这是他与一般作家区别开来的醒目标记。

长期以来,研究界有一个“沈从文之迷”的说法,认为沈从文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性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这也是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如果真有这样—个“谜”,而且非揭开谜底不可的话,也许这谜底并不神秘,就在于沈从文对于生命的追寻与探究。在某种意义上,他全部创作的主题都可归结为生命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此集中地以艺术的形式去表现“生命的复杂多方”,并且不管是从其深度和广度,还是就其看取生命的独特角度来说,沈从文都堪称首屈一指。他曾经这样明确地表白过自己对于生命的信仰,认为自己是—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人”,同时声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8]。对他来说,生命居于—切之上,对生命的信仰乃是—最高的信仰,这深刻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独特性都源于此,并由此形成其独特的生命诗学。

生命诗学在这里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大致的涵义是指直接指向人的深层生命状态,以生命观照为核心内涵,展示生命形式,同时赋予生命以审美关怀,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艺术世界。生命诗学强调文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文学形式是主体生命扩张、情感外化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生命本体进行审美观照的物化形式。文学对人的关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方面,作家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自我拯救,这使创作成为其—种不可缺少的生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执着于探询生命的真谛,追求生命的完美与至善,生命对其具有最高意义,因此,真正的作

家都不会把创作当作一种求取生存的职业,而是当作追问人生完善生命的事业。另一方面,真正的作家又通过创作取得与世界的沟通,实现文学由关怀自身到关怀他人、关怀普遍生命的拯救功能。文学由此通过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本体的审美观照实现其审美功能,在文学中实现普遍的生命升华和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生命诗学不仅具有人道主义的哲学内涵,而且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命价值系统和生命化的艺术世界的有机融合。生命诗学连结着创作的方方面面,既反映出作家整体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居于其核心位置的生命观,又反映出作家从其生命体验出发且基于其自身生命观而形成的创作个性,从而显示出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蕴涵的独特性。对艺术创作来说,生命诗学具有普遍意义,代表艺术创作的一种高级形态,因此,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达到的。就杰出作家而言,生命诗学的建构是其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他们创造的艺术世界中,总是或隐或现地表现出显现其主体独特性的生命诗学。

具体到沈从文,因其对于生命的看取和理解以及相应的艺术表现,都呈现出独特的形态,这决定着其生命诗学的内涵及其表现形态,也必然是独具一格的,具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在沈从文关注的所有问题中,生命问题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他所谈及的问题往往最终总要归结到生命问题上来,而他在直接谈到生命问题时,则又连结着与生命相关的种种问题。沈从文一再感叹生命的复杂多方,他在复杂的生命现象面前,也不无困惑乃至矛盾,然而对他这样一个对生命现象极其倾心的人来说,这只能深化他对生命问题的思考。检视他的文论和杂论,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高蹈于世的人,而是一个入世甚深的人。不过他的入世并不是从社会政治出发,也不是从伦理道德出发,而是从生命出发,从对生命的体验和关怀出发,因此,他所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都可归结到生命问题上来,或者说,他是从生命的

角度去理解社会政治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的,这就导致他思想上的独特性。沈从文自认为是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并决心要“用一支笔来好好地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9],就根源于这种思想上的独特性。这种思想上的独特性,反映到他的创作中来,就是通过展示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构筑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一个生命化的艺术世界。他所建构的湘西世界和与之相对立的都市世界,实质上就是两个呈现出对立形态的生命世界。前者代表一种理想的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是沈从文视之为生命寄托的精神家园,可以看作是民族生命精神的一种象征;后者则是一种堕落的处于枯竭状态的生命形式,在沈从文看来,这种生命形式不仅导致个体生命精神的沦落,“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而且使“整个民族向上发展即受妨碍”^[10],因而是一种应该“趋避”的生命形式。这两种对立形态的生命形式,成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基本构架,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生命问题的独特思考及其独特的艺术掌握方式。

独特性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作家区别于他人而获得独立创作品格的标记。很难设想,一个缺乏创作独特性的作家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能够长留于世。不过,独特性又是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对一个作家来说,独特性体现在其创作的各个方面,是由各种创作因素的有机构成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性效应,因此,要准确地把握一个作家的独特性,需用全面的观点,用整体性的眼光来看问题。长期以来,对沈从文的创作存在着种种争议,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创作独特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凌宇指出:“‘独特性’几乎是一致公认的沈从文创作的实质,也是揭开‘沈从文之谜’的核心问题所在。”^[11]独特性是沈从文在创作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是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但在如何看待这一关键性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却大相径庭。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几乎从沈从文为文坛瞩目开始,他在创作上所

显露出来的独特性就成为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进入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已趋于成熟,其独特的创作格局已基本形成,但从当时关于沈从文创作的评论来看,在肯定其“风格的独异的奇趣”^[12]和对青年读者的广泛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否定性看法,如“空虚的作家”^[13]、“没有思想的作家”^[14]、“作品人都是空洞无物的”^[15]、“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16]等结论,代表当时对沈从文创作的基本评价。更有甚者认为,沈从文“客气点说:一个文字的魔术师,不客气地说:一个挂着艺术招牌的骗子而已”^[17]。这种否定性评价表明对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这种论调影响深远,循此逻辑发展下去,并在其它因素的综合性影响下,到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评价转化为政治定性,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作家与反动文人,其作品的积极意义被消解无余,其创作上的独特性更是无从谈起,完全被时代现实的政治性所遮蔽。尽管沈从文文学生命的终结,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性结果,但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无疑是最直接的因素。这种论调的余波在沈从文复出后还一度重新抬头,终因不成气候而销声匿迹。检视长期以来对沈从文创作的评价,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如苏雪林在三十年代独具慧眼地指出,沈从文的作品是“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8]。李健吾则独到地发现沈从文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19]。但这些独到之见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以致长期以来湮没无闻,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重大的误区,沈从文创作上的独特性要么被误读、被扭曲,要么被漠视、被遮蔽,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尽管自沈从文“出土”以来,对他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毕竟还存在着不少的研究空白,尤其是对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

研究,尽管已经突破许多条条框框,特别是突破政治性因素的限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但还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具体说来,对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探究,还较多地限制于对外部因素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到沈从文独特的创作格局及其深层心理结构中去,需要深入到其独创性的生命诗学中去。造成这一局面的症结,在于对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根源缺乏深入的认识。沈从文对生命的独特看取与理解,是形成其创作独特性的核心内涵所在。沈从文不是鲁迅那样的思想型作家,也不是郭沫若那样的青春激情型作家,与茅盾那样的社会剖析型作家和巴金那样的情感型作家也有显著的区别。他是一个独特的生命型作家,其全部创作立足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立足于艺术世界的建构。从根本上说,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主体情感对象化的生命世界,他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通过艺术世界的建构,指向生命的终极意义与终极存在,由此构成其独特的生命诗学,其创作独特性就根源于此。因此,如果偏离生命视角,偏离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就无以真正把握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提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构想,试图为研究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探索又一条途径,藉此还原一个独特的沈从文,还原沈从文的独特性。

笔者认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提出,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能够切入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根本性问题,其意义在于:其一、从沈从文的生命观来看。正如他在《水云》中所宣称的,他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对生命的信仰深刻地影响到他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沈从文一生对政治都表现出极为复杂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地远离群体性的政治活动,不加入任何党派,反对滥用权力残害无辜,在权力与真理、知识的取舍之间,他信奉真理与知识,拒斥权力,他一再声言“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20]。这表现出他在主观意识上超脱政治的一面;另一方面,他

实际上涉及政治之深,又是他始料不及的,这与他超脱于政治的主观意识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近乎本能地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政治,以文学的思维方式和“乡下人”的道德标准判断政治问题,这使他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上,用一个比方的说法,他是一只脚踩在文学的“船”上,一只脚又踩在政治的“船”上,这两只“船”的方向却并不一致,因此,他很难在两只“船”之间保持平衡,结果他只有掉到水中去。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斥责沈从文“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生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溢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郭沫若据此断定沈从文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正如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指出过的,这种政治式宣判显然是错误的。但从郭沫若所列举的事实本身来看,确实都是沈从文用“笔墨”所指点过的,尤其是他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不少杂论中,不合时宜地对正处于生死交锋状态的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两手出击”,结果危及自身,造成自己的作品建国后在海峡两岸同时遭禁。在沈从文矛盾性的政治态度后面,隐藏着一种内发性的深层心理因,这就是他一生不曾移易的生命信仰。对沈从文来说,生命信仰已经内化到他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潜在地制约着他的行为方式与社会政治观念。这使沈从文在理性意识上对政治取“趋避”态度,因此从显性层面上看,他对现实政治似乎表现出一种超然性姿态,但来自深层的潜意识驱动力又使他对政治保持一种出乎本能的警觉。沈从文从自身经历出发,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中国,政治最直接地关乎生命个体与社会群体的

生死存亡,关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又使他不自觉地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去涉入政治,这种行动的深层心理动力出自生命至上的信仰与立场。沈从文政治上的矛盾性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创作,并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出来,形成其创作中一些特有的矛盾现象,其创作独特性也与此不无关系,同时这形成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一些独特性质,使其文学观念与创作风格呈现出独异的色彩。

其二、从沈从文的文学观与美学思想来看。沈从文不仅强调对生命的信仰,而且强调对文学的信仰,在他看来,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他曾这样告诫文学青年:“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见却要你们有‘信仰’”,“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21]对生命的信仰和对文学的信仰,构成其文学观与美学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出于对生命的信仰,沈从文总是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去注视生命与生活,他一再慨叹“人生可悯”,这种慨叹贯穿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其创作一种独有的基调,这使他的作品往往浸润着一种深沉的人生悲悯感与苍凉感,同时混合着一种对人生命运的无可奈何感,乃至虚无感。这使他的作品往往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融和着诗意的暖人色调,形成其独具一格且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牧歌情调,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在深层里却是一曲交织着悲凉与沉痛的歌吟,发人深思,显示出一种思想上与情感上的双重穿透力。沈从文的这种创作追求与风格色调,与其生命观具有内在的联系,源于他对生命的深情关注与深度透视。在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来,就是对人生悲悯感的强调,在他看来,人生悲悯感不仅是构成文学经典的一种重要质素,而且是他用来评价作家的一个重要尺度。他指出:“写作是要有信心,有热诚,不计功利,不问成败,正义感特别强,对人生充满悲悯博大情怀,而又能坚持到死去干的一分庄严工作。”^[22]他在论及鲁迅时,曾多次指出鲁迅作品中的人生悲悯感及其所蕴涵的深刻的诗意,认为这是鲁迅作品得到盛誉的一个重要因素^[23]。在他的许多评论中,都